



孙 玉 石 文 集

走近鲁迅余抄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 玉 石 文 集

走近鲁迅余抄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鲁迅余抄/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孙玉石文集)

ISBN 978-7-301-18047-1

I. ①走… II. ①孙… III. ①鲁迅著作 - 文学研究 - 文集②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I210. 97-53②I206.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288 号

书 名: 走近鲁迅余抄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47-1/I · 22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272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读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	1
对“革命文学”论争性质的一点看法	6
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	
——学习鲁迅“五四”时期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	20
深情的纪念 珍贵的记录	
——介绍几篇纪念鲁迅的珍贵短文	29
附：宋庆龄等纪念文章四篇	30
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	34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日本新译 20 卷本《鲁迅全集》陆续出版	39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之商榷	44
“民族魂”的知音	
——重温许寿裳对鲁迅阐释的一个侧面	68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 1 卷注释修订札记	73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 1 卷正文校勘举要	105
“近史”性质的学术突破	
——谈修订新版《鲁迅全集》	112
评说纷纭仍谈“新”	
——漫话 2005 年修订版《鲁迅全集》	114
总会有人走近和诠释这部经典的	
——2005 年版《鲁迅全集》第 1 卷注后琐言	123
阅读鲁迅“三思”	149
谈谈鲁迅研究中的“过度阐释”问题	

——鲁迅研究当代性与科学性关系的思考	153
深层理解与割舍不断的情谊	
——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160
在“鲁迅与书法”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65
在《鲁迅译文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170
鲁迅	
——近代文学辞典条目	176
《野草》拾零	
——《野草》题名的由来	180
鲁迅佚文注后附言	186
蕴蓄与文章美	
——鲁迅美学思想拾零	188
“刘喜奎的臣子”是怎么一回事?	192
做“劝孝”乐府的是谁?	195
拓荒者的姿态和品格	198
孤军奋战者的精神世界	200
略谈《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06
读《野草·题辞》	211
读《秋夜》	215
说《影的告别》	219
读《杂感》	222
读《夜颂》	225
读《二丑艺术》	228
鲁迅《野草》点评	231
《野草》导读	244
鲁迅:深化研究与自我调整	255
鲁迅与北京大学	261
走近高山和大海的精神桥梁	
——为《鲁迅大辞典》出版座谈会作	270
学术问路自述	275

读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

1927年4月8日,在广州一个风雨如晦的春夜里,鲁迅先生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修人陪同,应邀来到黄埔军官学校,在挤满了听众的小礼堂里,作了一次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这篇讲演词,后经鲁迅本人修改,收在他的杂文集《而已集》中。

鲁迅先生发表这篇讲演的时候,正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成败绝续的严重时刻。1927年1月,鲁迅怀着投入革命战斗的心情,从厦门来到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这一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南方工农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革命武装的支援,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同年3月21日,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一举占领上海。接着南京也相继克复。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对此却极端仇恨,他们策划种种阴谋,收缴工人武装,镇压农民运动,甚至制造惨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流血事件。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一味推行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人民武装革命面临被绞杀的危险。

鲁迅来到广州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他自己的敏锐观察,使他清醒地看到“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他痛切地感到,用革命的武装粉碎国民党右派反革命阴谋的极端重要性。同时,鲁迅也看到了广州文艺界的复杂状况。一些国民党

反动文人,组织所谓的“革命文学社”,打着提倡“革命文学”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勾当;原来躲在北洋军阀指挥刀下的“现代评论派”^①的反动文人,也“浩浩荡荡”从北京跑到广州,摇身一变,“都革命了”;另外,还有些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不敢正视现实,也在那里空喊“革命文学”的口号。在当时,革命的武装斗争要不要坚持到底?革命的战士要不要积极投身革命斗争?革命文学同革命究竟是什么关系?鲁迅正是在革命同反革命生死搏斗的重要历史关头,针对当时这些尖锐问题,发表了这篇重要讲演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是鲁迅论述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这时候,鲁迅在思想上已经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飞跃。在这篇讲演中,鲁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深邃的思虑,明澈的析理,清醒的预见,闪耀着鲁迅特有的思想光辉。

一年前,鲁迅在北京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枪杀爱国青年的“三·一八”惨案。从那些“目不忍视”的“惨象”和革命烈士“淡红的血色”中,鲁迅更加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了文艺必须服从革命的武装斗争这个道理。所以,在这篇讲演中,鲁迅首先分析了革命文学在整个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要进行革命武装斗争这一思想。他说:“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文艺家那种以为文学对于革命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的议论。血的“经验”使他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革命暴力上。在讲演中,鲁迅面对黄埔军校的军人,是那样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指出:“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他又是那样坚信不疑地歌颂了革命暴力的作用,断言“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才能加以改造。他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

^① 现代评论派,20世纪2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因出版《现代评论》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等,他们利用刊物公然替屠杀了爱国青年的北洋军阀政府辩护,后又投靠蒋介石。

轰走了。”

鲁迅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革命文学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尖锐地批判了在革命之前小资产阶级的“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喊冤”文学。因为它“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他希望蕴有力量的民族“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待到“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但是，鲁迅又用他多年得到的血的教训，给大家揭示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事实：“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在这些十分浅近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里，鲁迅讲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反革命武装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革命人民必须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的暴力，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正是从这点认识出发，鲁迅才无比愤慨地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他奉劝“捏枪的诸君”，“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声明自己“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深刻见解和对革命战争的由衷歌颂。

鲁迅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是鲁迅针对革命文学家同革命斗争的关系着重论述的另一个光辉的思想。

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是革命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也是造就革命文学家的宏大熔炉。一个革命文学家，只有参加革命斗争，才能“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鲁迅具体分析了革命发展的三个时期同文学的关系，明确地阐发了革命文学家必须投入革命斗争，做一个“革命人”的道理。在革命前，革命文学家要“反抗”，要“复仇”，代表“觉悟起来”的民族，唱出他们的“愤怒之音”。只有反抗的战士，才能写“怒吼的文学”。在革命高潮中，革命文学家应该“受革命潮流的鼓荡”，“由呼喊而转入行动”，积极投身于“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的斗争。而不能关在屋子里“做文章”，要做时代的“弄潮儿”。

在革命胜利后,革命文学家应该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为革命的胜利唱出“崭新的进行曲”。离开了革命斗争,就没有革命人,自然也就没有革命文学。

鲁迅在讲演中告诉人们,要做“革命人”,文学家必须去掉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东西”。鲁迅说,革命地方的文学家喜欢谈论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但是,倘若他们不注意改变自己头脑里的“读书人的思想”,不仅他们写出的那些鼓动革命的作品是“无力的”,而且容易把革命“写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学家那些“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才是“好的文艺作品”。这正是鲁迅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相反,如果一个文学家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便会对旧社会恋恋不舍,为旧制度的灭亡“唱起挽歌来”。十月革命后逃亡外国的旧俄文学家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鲁迅在这里强调了革命文学家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后来革命文学队伍的变化,证明了鲁迅这些意见是多么深刻和尖锐!

鲁迅在讲演中还以清醒的预见推想了革命文学发展的方向。他鲜明地提出:“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关于革命文学同群众的关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这篇讲演论述的第三个光辉思想。

首先,鲁迅坚信:“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革命的最后胜利,必然是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他们在文艺上才有“开口”的权利,“真正的平民文学”,即人民大众的文学,才有可能得到广大发展。鲁迅后来说,工农群众的文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鲁迅还分析了文艺的现状,明确指出,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的工人农民还受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文学“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第二,有人以工人农民为材料作

小说作诗,虽然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还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第三,即使一些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其中“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鲁迅指出:“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鲁迅这段话抓住了平民文学问题的实质。它告诉我们,要创造真正的平民文学,不仅劳动人民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文学家也必须把自己头脑中的“读书人的思想”变为工人农民的思想,使自己从“另外的人”变成工农自己的人。这个深刻道理,为革命文学家努力创作“真正的平民文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鲁迅讲演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水。绞杀革命的枪声也弥漫在广州街头。鲁迅的预言说中了,“革命的策源地”变成了反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就因为营救共产党员学生无效,愤怒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几个月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无比愤慨地写当时的情景:“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餐蚊遥叹,余在广州。”从那时起,到今天已经五十年了。“大夜弥天”的黑暗中国已经变成洒满阳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了。整个世界也已进入革命的时代。伟大的革命时代需要战斗的革命文学。此时此刻,我们重温鲁迅的这篇讲演,该有多么亲切和有益啊!

(原载《中国文学》英文版 1977 年第 9 期)

对“革命文学”论争性质的一点看法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多年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之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实质上是鲁迅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创造社对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是由来已久的。

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萌芽于1927年的“八七会议”之后。在11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内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远在大革命失败以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已经酝酿着“转变方向”和提倡革命文学了。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包括文学领域里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正是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文艺运动发展中的必然反映。

^① 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3版序言。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了巨大胜利。千百万的农民群众“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①。革命斗争的迅速高涨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文学必须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必须更多地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是历史对革命文学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民众正在‘水深火热’的压迫里挣扎着的当今,又得了多次的革命行动的实际的经验。他们有反抗的感情,求解放的欲念,如火如荼的革命的思想。把这些感情,欲念,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就是艺术——文学——的任务,也是主张革命文学家的任务。”^②创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酝酿产生的。

早在“五卅”运动以前,郭沫若、成仿吾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古典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提出文学新运动要“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③。1926年,他们又进一步探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更加明确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4月,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叙述了现实斗争和翻译列宁的著作在自己思想中引起的深刻变化。“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5月,他又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和《革命与文学》两篇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对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艺,“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要采取“彻底反抗的态度”;革命的文学家“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与此同时,成仿吾也发表了《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提出革命文学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③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

“要紧的是所传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①这一正确主张。由于他们当时都从事实革命斗争,又未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革命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模糊错误的观念。因此,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在1927年1月到11月以前,即瞿秋白路线尚未最后形成的时候,创造社的一些刊物上,又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提倡和讨论革命文学的文章。以《洪水》半月刊为例,仅在1月至9月里,就发表了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十多篇。这些文章,对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各不相同。有倡导的,有反对的。即使主张革命文学的,观点也相当芜杂矛盾。如郁达夫有的文章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当然是存在的”^②;有的文章里却又断然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时期未达到以前,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会发生的。”^③成仿吾在批判资产阶级“趣味文学”时,也错误地把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陈西滢并列加以讽刺^④;还把人类“赤子之心”的“鼓动”视为革命文学的“原动力”^⑤。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些文章里已经提出了革命和文学的“方向转换”的问题;发展和完成“五四”文学革命任务的问题;特别是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必然性的问题。如郁达夫就说:“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要求支配政权,要求解放的革命,那么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⑥这些主张,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后期创造社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是这些滥觞时期主张的必然发展。它的发展必然伴随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斗争。即使没有瞿秋白的“左”倾路线,运动必然崛起,斗争定会发生。这是毫无疑义的。

① 《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日。

② 《〈鸭绿江上〉读后感》,《洪水》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6日。

③ 曰归:《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1日。

④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

⑤ 仿吾:《文艺战的认识》,《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8期,1927年3月1日。

⑥ 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6日。

在革命文学运动的酝酿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在1927年年底以前,提倡革命文学的过程中,鲁迅和创造社都是愿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的。早在1927年,鲁迅就曾想到广州以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由于创造社一些人参加北伐,离开广州,遂未如愿。但是,在1927年4月1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由鲁迅、成仿吾、王独清等人联名签署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抗议在北伐军占领南京时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制造“南京惨案”,希望“英国底无产民众和无产的智识阶级联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同情的回答”。编者还发表“按语”说:“这个宣言是我们一种忍无可忍的表示”,“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②。这是鲁迅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的第一个实际行动。从4月到10月,鲁迅还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等文章,提出了“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光辉思想。这些文章里实际上饱含着对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热情赞助和诚恳批评。

1927年10月,鲁迅、郭沫若及其他一些青年进步作家相继来到上海。当时创造社的一些人,深感在大革命失败后,有“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的必要,用文艺战线的斗争,“为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他们在郭沫若的支持同意下,郑伯奇等先后两次访问了鲁迅先生,共同商量成立联合战线的事情。鲁迅“立即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③。这个联合战线计划,后来由鲁迅、郭沫若(当时化名麦克昂)领衔,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人签名,发过一份启事,名叫《〈创造周报〉复活宣言》,并在1928年1月1日公开发表,见诸报端了。只是由于创造社新成员的回国,带来了他们在日本早已酝

① 1926年11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

② 《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

③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

酿好的计划,其他有些成员这时也以为《创造周报》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废除了前议,联合战斗的决定便成了一纸空文,无形中作罢了。联合虽未实现,意义却很深远。它说明,就在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形成和取得统治地位以后,1927年底以前,创造社在提倡革命文学运动这个问题上,同鲁迅的立场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什么路线分歧。

事实有力地说明,创造社1928年倡导的革命文学运动,不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①

事实还有力地说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是一时突然的现象,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这一点,当时论争中站在创造社对立面的韩侍桁也看出来了。他就这样说过:“创造社倾向于无产阶级文学,想把革命与文学结婚,明面看着虽然是从今年的新正开始,但细细地考察起来,却绝不是突然的,他们之所以在今日发酵了,也实是经了很长久时期的酝酿。”^②

二

创造社改变同鲁迅结成联合战线的计划,突然单独地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反而把鲁迅作为革命对象加以攻击,是自1927年冬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几名新成员开始的。他们在1928年1月创刊的《文化批判》上,首先发难,连续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在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作家“转变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同时又错误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鲁迅,因而挑起了这场论争。鲁迅写了《“醉

①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②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上),《语丝》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眼”中的朦胧》等文章进行了回击和批评。接着,创造社、太阳社的主要成员,都把鲁迅视为提倡革命文学的敌人群起而攻之,使论争愈演愈烈,遂使“平静的中国文坛,到了这一年,突然起一大波浪”^①。

论争开始之际,正是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之时。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明,后期创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的产物呢?

我们先看一看它的酝酿过程吧。

据郑伯奇同志1962年写的《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这篇文章回忆说,大革命时期,这几个青年人正在日本留学。冯乃超、李初梨学的是文学。“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颇有参加者,他们也受了相当的影响。”在这以前,李、冯两人曾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过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作品。但是,“接触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后,他们的思想起了变化,主张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应该转变方向”。他们非常关心创造社,希望它“能转变方向,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此,李、冯、彭、朱还开过几次小会,商议了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针和办法,并让参加了讨论的郑伯奇同志回国,“把这些意见带回创造社,和沫若、仿吾、达夫商量具体办法”。在郑伯奇带着这些意见回国途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了。后来,成仿吾又专程赴日本,同他们讨论改造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计划^②。从这个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后期创造社的几个新成员,关于文学家“转变方向”的主张和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开始酝酿的时候,还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的大革命高潮中。当时党内的斗争,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形成,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再看一看后期创造社在“革命文学”口号下的理论和实践。

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否认中

① 魏克特:《鸟笼室漫话》,《海风周报》第4期,1929年1月20日。

②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

国革命的暂时低潮,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而且“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而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鼓吹城市武装暴动是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和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①。二、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当时“必然要急转直下的近于社会主义的革命”^②,因而错误地把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障碍”^③,实行过“左”的政策。

诚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确实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的特征。有些观点和词句,同瞿秋白的主张也有类似或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同瞿秋白的理论也有许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背谬之处。一些词句的相同也不完全等于路线的一致。

关于革命转变问题。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在转换期的中国怎样建设革命艺术的理论?”^④什么是“转换期”?李初梨做过这样的说明:“这一个方向转换,决不能实行于前年或去年上期,这必然地应该实现于去年的年底或今年的新正。因为在去年的八九月间,革命才入了它的第三的阶段,在十冬月间,普罗列塔利亚特才把它的政治方向转换完结。”^⑤有人认为,这个“十冬月间”方向转换的“完结”,就是指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的路线变化,并以此作为创造社受瞿秋白“左”倾路线影响的佐证。这种理解未免太机械了。李初梨的原文前面叙述的是:“经过国内布尔乔亚汎及小有产者智识阶级相继叛变的两个阶段以后,即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的 Hegemonie 确在了的今日,革命文学当然被奥伏赫变(不是鲁迅的‘除掉’)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⑥这里讲的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阶级营垒变化的情况,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出现的必然性。对于

①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5期。

② 《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11期。

③ 《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7期。

④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号,1929年1月15日。

⑤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化批判》第4号,1929年4月15日。

⑥ 同上。